

敦煌讲座书系

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



屈直敏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讲座书系

屈直敏 著

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 / 屈直敏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1. 1

(敦煌讲座书系)

ISBN 978-7-5423-2404-7

I. ①敦… II. ①屈… III. ①敦煌学—文献—研究②教育史—研究—中国—中古 IV. ①K870.6②G5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7548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策 划: 王光辉 薛英昭

项目负责人: 秦才郎加 王露莹

责任编辑: 卢 政 朱黎明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赵 鹏

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

屈直敏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4.75 插页 4 字数 332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23-2404-7 定价: 50.00 元

总 序



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曾经是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中原王朝的边镇和经营西域的基地，更是东西文化交往的丝路重镇，蕴涵着多元文化。公元4世纪开始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迄今仍保留着大量的洞窟、塑像、壁画，而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写本和绘画等，数以万计，内容丰富多彩。

敦煌石窟的美术作品和藏经洞的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构成了百年来敦煌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加上周边石窟、简牍、墓葬出土文物，敦煌学研究的内涵并非仅仅限于敦煌。敦煌学研究的范围，涉及宗教、思想、历史、考古、语言、文学、美术、科技等等许多学科，利用敦煌保存的材料，学者们对于这些学科的研究构成了现代学术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敦煌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有的学者把敦煌学看作是一部伤心史，陈寅恪先生虽然不太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指出当时中国研究敦煌学者不过三数人而已，且“罕具通识”。历史的车轮转到21世纪初，中国敦煌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敦煌学越是深入发展，也有着题目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的倾向。敦煌学的成果越来越多，有自己的刊物和专题会议，与

学界其他领域的沟通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外界面对如此庞大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即使想略知一二，也不知从何下手。这样的倾向其实严重影响着敦煌学的发展和进步。

在 21 世纪，敦煌学的发展不仅仅要追求新材料，还要向其他学科学习，进一步更新方法，思考新问题。

我们发起编纂《敦煌讲座》书系，就是希望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撰写一套敦煌学各个分支领域的通论性著作，体现百年来国内外敦煌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代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整体水平。这套书的作者队伍以中青年敦煌学研究者为主，希望新人写新书，把相关领域的敦煌学研究水平系统地呈现出来。每本著作既是作者对某一领域研究的代表作，又是能够让敦煌学领域外的人阅读、参考的读物，可以引导读者进入敦煌学的相关领域。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版过 9 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不同类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材料做了通论性的阐述。现在 30 年过去了，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上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资料也比较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图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结合，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法、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阐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

敦煌学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敦煌讲座》书系可以说是我们努力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我们期待今后敦煌学的新人谱写更加美好的篇章。

《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

(荣新江执笔)

2013 年 9 月 30 日

前 言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扼中西交通之要冲，在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汉武帝凿空西域之后，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中原王朝开始对河西地区实行有效管辖，从而加强了对河西地区的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割据政权林立，战祸不断，中原王朝虽然也致力于对河西的经营，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个大动荡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出现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等割据政权，史称“五凉政权”。因河西地区独处西北一隅，位置偏僻，未受中原战火的影响，故社会相对稳定。而“五凉政权”的统治者，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推崇和倡导儒学，重视儒家知识分子，积极兴办学校，从而吸引了大量中原士人避乱河西，促进了河西地区文化的繁荣，故在中原战祸连绵、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摧残的大动荡时期，地处西北边陲的河西地区却反而儒学发达，名家辈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兴盛局面。隋唐时期，南北一统，对河西的经营再次进入高潮，不仅经营范围大大拓展，而且建立了巩固的统治，实现了更为有效的管辖，成就极其显著。显然，自西汉至隋唐，历代统治者无不醉心于河西的经营与开发，而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在河西地区的扩展，儒家知识文化也随之西渐，并成为河西地区的文化主流。推而考之，其教育之兴，功莫大焉。

中国古代以儒学为正统的官学教育，肇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经魏晋南北朝之发展，到隋唐之际，不仅中央官学种类繁多，而且地方普遍设立学校，其教育体系之完备，制度之严密，前所未有，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自此进入全面普及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内忧外患，国家贫弱，有识之士，思救亡图存之计，建重教兴邦之策，其对中国传统教育的研究也逐渐为人们所瞩目。综观近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教育的研究，教育史、教育制度史、教育思想史为之重阵，但大多过于粗简，仅述其大纲脉络而已。虽然对中国古代中央官学教育制度的沿革、共同性教育特质的传承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且成果丰硕，不可胜计（对此学界已有评述，不再赘述），然仅对中古时期的教育而言，前辈学者由于时代之局限，对出土的汉简和敦煌文献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加之传世文献的记载或付诸阙如，或语焉不详，故对中古时期地方学校教育的探究较为薄弱，尤其对中古时期教育特质的变迁更是鲜有涉及。

20 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量敦煌写本文献，从而极大丰富了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的历史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史的内容，使人们对该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众多人文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受益匪浅。特别是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大量有关官学、寺学、私学、技术教育等方面的资料，为中古时期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学校生活和知识传承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启示。

自敦煌文献被发现之后，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敦煌文献及石窟竞相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到 20 世纪末，海内外掀起了敦煌学研究的热潮，并且成为学术新潮流，从而使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显学。相对于敦煌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而言，关于敦煌教育的研究却为数不多。较早关注敦煌教育的有日本学者那波利贞和小川贯次。那波利贞主要据唐抄本《杂抄》考论唐代的庶民教育，首开以敦煌

写本文献探讨唐代教育之先河。^①小川贯式主要是对敦煌写本文献中的学士郎题记进行全面考述,揭其历史价值和意义。^②大陆学者李正宇在全面搜集整理敦煌学郎题记的基础上,又对敦煌的学校教育进行了初步研究。^③汪泛舟主要对敦煌儿童教育读本进行了分类介绍和简要分析,力图呈现敦煌古代儿童课本之识字、教育、应用之总貌。^④台湾学者高明士也对敦煌官学、寺学、私学教育及教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论。^⑤郑阿财、朱凤玉全面搜集了敦煌文献中的蒙书,按识字、知识、德行进行分类和介绍,探讨了敦煌蒙书的分类、特点和价值。^⑥日本学者伊藤美重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学郎题记”和“童蒙教训书”为主要资料,探讨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学校教育之变迁和童蒙、庶民、士人教育之规范。^⑦此外,姜伯勤^⑧、张弓^⑨等学者对敦煌寺

① [日] 那波利贞《唐钞本〈杂抄〉考》,《支那学》第10卷,1942年,第1—91页;后收入《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二编,东京:创文社,1974年,第197—268页。

② [日] 小川贯式《敦煌の学士郎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1卷2号,1973年,第84—89页;又《敦煌佛寺の学士郎》,《龙谷大学论集》第400、401合刊号,1973年,第488—506页。

③ 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第39—47页。

④ 汪泛舟《敦煌的童蒙读物》,《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第104—107页;《敦煌古代儿童课本》,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⑤ 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第231—270页。

⑥ 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郑阿财《敦煌石窟寺院教育功能初探——论敦煌三界寺的寺学》,《华学》第9、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40—1050页。

⑦ [日] 伊藤美重子《敦煌文书にみる学校教育》,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

⑧ 姜伯勤《敦煌音声人略论》,《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第1—9页;后收入姜氏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敦煌心史散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09—526页;《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81—105页。

⑨ 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54—875、975—984页;又《公元九、十世纪敦煌的寺学教育及其儒经读本》,《第12届国际佛教教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华梵大学,2002年,第14—25页。

学、乐营等也有过探讨。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上述成果多属个案性研究，绝少将敦煌教育之研究置于中古教育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对中古时期教育特质的变迁也鲜有留意。

本书之所以以敦煌文献与中古教育为题，缘于中古教育处于中国古代教育之大变革时期，且敦煌文献中有关教育之资料也多属于这一时期。然而本书无意探讨中古教育的全部与整体，这主要是由于学识有限，并非不为，实乃不能。在此主要结合传世文献与敦煌文献，对中古时期的教育进行简要探讨，略考中古时期中央官学教育体制的建置沿革与流变，详述地方教育的发展与中古教育特质的变迁，意欲推明中古时期儒学教育是以教化万民为要务、以成贤为目的、以成圣为最高理想，旨在阐明传统教育是以人之德性化育、观念塑造为本，以知识之传授、技能之培养为具。广而论之，教育乃国之根本，传统儒家重德教之理念，融通诸学之特质，于大一统民族、国家之观念、文化之建设，功莫大焉，可为当下教育龟镜之处良多。

本书以中古时期为时间断限，对中国古代教育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乃不得已而为之，实属勉强。众所周知，历史的发展永远是连续不断的，决不能将其割裂成片断，而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不可避免会流于武断，并冒犯历史的真实性和连续性。然而作为研究者，由于各方面的局限性，无力叙述连续整体的全部历史，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为了便于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叙述的条理性调和起来，而划分历史时期，进行选择性的研究，乃不得不为之事。在此虽然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但研究过程中，已尽力不为分期所限，溯其本源，考其流变，希冀这一时期的划分能够表明事情的本真，而不会造成过多的断裂现象。然学识浅薄，寡闻陋见，讹误阙漏，在所难免，祈请博雅君子，不吝赐教。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敦煌学校教育探源	1
第一节 汉代中央官学概述	3
第二节 汉代地方官学概述	11
第三节 汉代敦煌学校的建立	28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官学教育	35
第一节 三国两晋官学教育	37
第二节 南朝官学教育	48
第三节 十六国官学教育	56
第四节 北朝官学教育	62
第三章 隋唐官学教育	73
第一节 隋代官学教育	75
第二节 唐代官学教育的兴废	79

第三节	唐代中央官学教育	94
第四节	唐代地方官学教育	135
第四章	敦煌学校教育	155
第一节	敦煌州(郡)、县、乡学教育	158
第二节	敦煌的道学与寺学教育	168
第三节	敦煌学校的师资	186
第五章	敦煌职能技术教育	197
第一节	音乐教育	199
第二节	伎术教育	208
第三节	绘画教育	217
第六章	敦煌文献与中古教学内容	229
第一节	经学教材	231
第二节	史学教材	240
第三节	医学和道学教材	248
第四节	蒙学教材	252
第七章	从敦煌文献看中古儒学教育之独尊与普及	257
第一节	从先师到先圣——儒学教育主体地位的确立	259
第二节	从精英到大众——儒学社会教育体系的建立	274
第八章	从敦煌文献看中古教育特质的演变	299
第一节	移孝就忠——儒家道德伦理教育体系的重建	301
第二节	融通三教——儒、释、道并用教育方针的确立	328
参考文献		357



第一章

敦煌学校教育探源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据甲骨文的记载，在殷商之际似已出现。^①然而商周时代，实行的是官师政教合一体制，学术为官府所垄断，凡为官者皆可为师，学术教育与政治教化混而为一。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权威丧失，开始出现“周室陵迟，礼崩乐坏”^②、“道术将为天下裂”^③的局面。学在官府的旧秩序遂逐步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④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周代的官学体制被打破，私学代之而兴。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便出现了官学和私学两种教育制度的传承。

① 黄建中《殷周教育制度及其社会背景》，《大陆杂志特刊》第1辑下册，1952年，第322—323页。

②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卷六《声音》，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

③ 郭庆藩撰，王孝渔点校《庄子集释》卷一〇《杂篇·天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9页。

④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七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389页。

汉代中央官学概述

汉代上承秦代吏制教育之旧制，下启儒学教育之端绪，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以儒学教育为核心的官学制度，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焚诗书，禁私学，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意欲复古而失其度制。汉初，天下初定，儒生始得复修其业，然而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儒生，叔孙通虽然率领众儒生定朝仪，但无暇顾及庠序之事和文教之业。文景之世，虽然征用儒生，立博士之官，以经学教授生徒（图 1-1），但窦太后好黄老之术，故博士具官待问而已。至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等竭力倡导兴立太学。元朔五年（前 124）夏六月，汉武帝采纳了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等人的建议，^①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②一般认为这是汉兴太学的开端，然而亦有学者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18—3119页。班固《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3—3594页。

②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1—172页。



图 1-1 伏生授经图

认为这只是因“旧官”^①而建立的中央官学教育制度，实属制度的草创，并无统一的学校机构，与后世的太学不尽相同。^②如张金光先生认为汉初承袭了秦代的学吏制度，“汉自孝惠废挟书律，文帝立博士，武帝于郡国设学校官，学吏的途径扩大了”。^③王爱清认为西汉有两套不同的官学教育体制，一是早在西汉建国伊始就已着手建立的，以培养史、卜、祝专门人才为目标的官学体制；一是文翁在蜀地兴校办学才出现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官学教育体制。^④高宗留认为西汉在武帝之前即存在官办教育，其内容包括教授律令、刑名以及史、卜、祝等，是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汉武帝所设官学只不过是将从秦朝以来一直处于低谷的

① “旧官”，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〇《学校考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2页）注释云：“旧官，为博士旧授徒之黉舍也。至是官置弟子员，来者既众，故因旧黉舍而兴修之”。

② 陈东原《中国教育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4—45页。高明士《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12页。

③ 张金光《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第30—39页；又《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第65—72页。

④ 王爱清《西汉官学教育体制新议》，《绥化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第90—92页。

儒学立为官学。^①宣成之世，也曾下诏兴建太学之事，^②似与汉武帝置博士弟子的制度相同。

西汉太学校舍的营造，到王莽执政时才完成。平帝即位，王莽为安汉公秉政，元始四年（4）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讖、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③现存大约有十余面王莽时的铜镜，其铭文均有“兴辟雍，建明堂”、“作辟雍治校官”等王莽兴学之举的明确记载。^④显而易见，王莽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更始元年（23）绿林军入长安，焚毁明堂、辟雍。建武元年（25）赤眉军到长安，再次焚烧宫室市里，王莽所建的太学校舍也在这场战火中化为乌有。

在经历十五年的战乱之后，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政权，积极重建官学教育体系。建武二年（26），光武帝以固始侯李通为大司农，“帝每征讨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师，镇抚百姓，修宫室，起学官”。^⑤建武五年（29）在新都洛阳重建太学，筑博士舍、内外讲堂，其设置与西汉太学相当，于时“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⑥中元元年（56）建立明

① 高宗留《汉代官学并非自汉武帝始立——从〈张家山汉简·史律〉谈起》，《科教文汇》2008年第1期，第51页。

② 班固《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43页）本始二年（前72）夏五月诏，又卷一〇《成帝纪》（第313页）阳朔二年（前23）九月诏。

③ 班固《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第4069页。

④ 王纲怀《莽式铭文镜（三、四）》，《收藏家》2008年第7、8期，第53—60、69—74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一五《李通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75页。

⑥ 范晔《后汉书》卷四八《翟酺传》，第1606页。

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明帝永平二年（59）三雍初成，“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①迄明章之世，由于东汉统治者对太学教育都比较重视，经常亲临太学及辟雍，养老行礼，讲经辩学，奖赐太学博士及弟子极为丰厚，导致学风大盛（参见表一），因而影响远及周边四夷蛮荒民族，如匈奴派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到太学学习。^②这是中原王朝最早接受外邦留学生的记录，由此可见，东汉的太学教育可谓盛况空前。

表一 东汉皇帝励学表

帝号	年代	公元	地点	记事	出典
光武	建武五年	29	太学	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	《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建武七年	31	太学	车驾亲临观飧，将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	《后汉书》卷三三《朱浮传》
	建武十九年	43	太学	会诸博士论难于前，（桓）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馱，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	《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
明帝	永平二年正月	59	明堂	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礼毕，登灵台	《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

① 范曄《后汉书》附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上》，第3108页。

② 范曄《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附族曾孙準传》，第1125—1126页。